

“海霞”二三事

曹凌云

编者按:清明怀古,是对英雄的缅怀与致敬,是对亲朋的回忆与追思,是对习俗的敬仰与传承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让我们写下那些悠长的记忆,以敬故人。

3月22日傍晚,我收到一位洞头朋友的微信:汪月霞老人今天不幸离开了我们,享年87岁。这一噩耗让我顿感心伤,不由想起汪老一生的传奇。

汪月霞是原洞头女子民兵连连长、著名民兵英雄、电影《海霞》中主人公海霞的原型。我初次拜访汪老,是2017年12月的一个周末,她住在温州新城站附近的一个住宅区里,那年已82岁了,圆圆的脸庞,微胖的身材,腿脚很不灵便,走路依靠拐杖与轮椅。那几年她患有神经性皮肤过敏,看了不少医生,但一说起往事,就忘记病痛,来了精神。

2018年,我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《海上温州》,与汪老有过一次长聊。

汪老说:“我家桐桥村位于洞头岛的东面北山,三面环山,一面临海,对着棺材岙岛。1949年解放军为了全面解放洞头列岛,登岛时就到过我家,我家是一间矮屋,建在路边,他们来时喝了我烧的水,我家没有大米,正是冬天,有埋在地里的番薯种,挖出来烧给士兵吃。”

1952年1月,解放军攻打棺材岙时,部队官兵大多驻守在桐桥村。13日晚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,两个国民党兵撞开汪月霞的家门,叫她给他们烧开水,年少的她很害怕,就烧了水,国民党兵紧张地喝了几口水就走了。汪月霞关好了门,一会儿,听到房外有“哒、哒、哒”的整齐脚步声,猜想是解放军来了,她拉开一条门缝,看到士兵拿着红旗,果真是我们的军队。她打开房门,跑到隔壁大嫂家,叫着:解放军来了,出来,出来。大嫂和邻居们听到后都出来了。

14日拂晓,汪月霞见到一批批的伤员从棺材岙运送过来,在她和邻居家门口或坐或躺,流着鲜血,几个卫生员根本忙不过来。汪月霞一铲一铲地给部队烧水,村里

缺水,她拿着水桶去远处的水井提水。

15日,解放军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,终于打下了棺材岙,洞头解放了。

汪老说:“我很小就跟母亲去海边礁石上打海蛎子,我力气小,打得很吃力,但也尽量想打多一点,母亲要上山割柴草,我提着海蛎子与小伙伴一起去码头上叫卖。”汪老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渔民。在她10岁那年,父亲因出海打鱼没有“牌照”,被国民党兵毒打成重伤,回来后不久中风,撒手丢下一个苦难的家庭走了。没有了父亲,家里揭不开锅,汪月霞带着弟妹上山挖野洋葱,到亲戚家的地里摘些番薯叶充饥,有时拿个小篮子去亲戚家要点新鲜的虾皮炒洋葱。

洞头解放后,驻岛部队官兵分散住到村民家里,军民关系就像家人一样。各村纷纷成立了青年团、妇女会、儿童团等组织。1955年,北沙乡成立人武部,建立民兵连,桐桥村成立了女民兵排,汪月霞当排长。女民兵经过艰苦的训练,学会打枪,还帮助战士洗衣服、种地、养猪,有时还出海打鱼。旧社会女子是不能出海打鱼的,传说女人划船船会翻,女人打鱼网会破。1958年,汪月霞加入了共产党。

1959年5月,在虎头屿打防空洞的战士断水多天。当时,海面上连续刮了好几大风,交通已经中断。汪月霞接到了送水任务,她带着女民兵驾着小舢舨,迎着7级风浪,载着一桶桶淡水,驶向虎头屿。虎头屿是无人居住的荒岛,没有路,人在山脊上只能匍匐而行,她们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,把一桶桶淡水送到战士面前。

1960年4月,汪月霞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。那是一个万人大会,大会安排代表发言,汪月霞荣幸地走上发言台。

她讲了洞头的军民联防,虽然有稿子,却脱稿讲了一个小时,引起轰动,会后被记者围着采访到深夜。大会期间,有领导跟汪月霞说:毛主席要接见16位民兵,你是其中一位。

大会开到最后,代表们接到通知:晚上男同志把胡须剃干净,女同志稍作打扮。大家心里明白,可以见到毛主席了。

第二天,大家分三批去中南海怀仁堂,汪月霞分在第一批,大家都万分激动。当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走到代表们面前时,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毛主席在前排就坐,汪月霞坐在毛主席右手的第三个位子。毛主席侧过头来笑着问汪月霞:你们都是普通民兵,我到你们那里当个普通民兵好不好?浓浓的湖南口音那么亲切。

大会闭幕后,汪月霞去了南京,向南京军区要求建立女子民兵连,军区首长表示赞同。1960年6月,北沙女子民兵连成立,后改称洞头女子民兵连,汪月霞任连长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大陆东南沿海形势严峻,经常遭到敌特袭扰,地处海防前线的洞头岛情况更复杂,成了保卫祖国的最前哨,汪月霞和姐妹们一起投入了洞头岛的保卫战斗。

洞头岛有12个岙口,特务常常假装成商人或渔民开船登岛,因此每个岙口都要来回巡逻,24小时坚守,抓到特务交给公安局处理。冬日天寒地冻,夏日酷热难当,都能见到姑娘们挺拔的身影。她们的热血像男儿一样泼洒在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上。

女民兵们训练、生产、演出、政治学习、夜校扫盲,还要经常参加射击表演,很是辛苦,但女子连的每个战士都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。女子连也像磁石一样,牢牢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民兵,光荣地走到了今天。

三

让汪老念念不忘的,还有电影《海霞》。

据汪老回忆,1963年,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的黎汝清,奉命前往洞头6连担任代理辅导员,深入体验生活,全面了解了女子民兵连的发展历程后,动手创作长篇小说。一年后,黎汝清完成了10余万字的《海岛女民兵》,讲述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哺育下,与渔霸陈占鳌、潜伏敌特刘阿太等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,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女战士。

如今,汪月霞老人离开了我们,一个爱

国华兄弟,咱想你了。
2003年腊月廿七,壮实的曹国华悲壮地倒在了火场上。突然传来的噩耗,让我如跌入冰冷的奉化江里,痛得窒息。

消防员奔赴一个火场就是攻克一个新的战场,见过生死方是真兄弟。21年消防集体生活已经淡淡忘去,唯独国华那一脸的阳光不曾磨灭,记得清晰。

国华兄弟

蒋孝辉

国华兄弟,咱想你了。

2003年腊月廿七,壮实的曹国华悲壮地倒在了火场上。突然传来的噩耗,让我如跌入冰冷的奉化江里,痛得窒息。

消防员奔赴一个火场就是攻克一个新的战场,见过生死方是真兄弟。21年消防集体生活已经淡淡忘去,唯独国华那一脸的阳光不曾磨灭,记得清晰。

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烈士墓附近的桃花开得繁华绚烂。桃花依旧,物是人非。

2003年从北京回浙实习,零下10多摄氏度的那个冬天,国华让自己的那条军被,让我们兄弟几个裹在一起互相取暖,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,在列车上一路站了31个小时才到杭州。他说:“我胖,我不怕冷。”我没想到,这会是我们的诀别。

曹国华从军入伍,可谓正当其时,一到消防队,服役第一年就被破格提为战斗班长,入伍第二年荣立个人三等功,入学第一学期被推选为区队长……

国华24年人生,短暂繁华之后,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思念。为了保护更多的财产,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踏着火灾现场后,学院领导说:“凭我30多年消防经验,本次灭火战斗,国华指挥得当,十分有效……”

每当春天来临,母亲曹春竹都会奔走在乡野里,嫩若凝脂的地衣炒鸡蛋,色香味俱全的清汤螺蛳,曾是国华的最爱。尽管国华牺牲已十年,她的梦里梦外时时泛起点点滴滴。“可以不光宗耀祖,但要视百姓为父母,我们一直这么教育他。”“真不敢相信,我的儿啊……”说起国华,满头华发的曹春竹泪如雨下,深深浅浅的皱纹里雕刻着思子的煎熬。

二

一晚晚消防车的警报声划破夜空,周而复始地刺扎着我的神经。

国华牺牲后,我匆匆结束实习,提早返回学院整理国华先进事迹。乍暖还寒的廊坊,空荡荡的校园,孤零零的教室,和国华一起学习、踢球的情景,却怎么也避不开。多少个黑漆漆的夜晚,双脚踩在深深浅浅的水汪塘里,泥水泼溅在小腿肚上一阵又一阵的冰凉,漫无目的地绕走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。光秃秃的白杨树在四月灰蒙蒙的阴雨里随风摇曳,没有生机,让人绝望。双脚铅一般沉重,再也抬不动鞋底沾满黄泥巴的“三节头”皮鞋,慌得我不知如何是好,蹲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,号啕大哭,风呼呼地夹杂着沙子拍在脸颊,像是暴晒后脱皮那种灼痛。

我麻醉自己,在四百米障碍跑上不断折腾,试图让心有个栖息的地方,以减轻失去兄弟的痛。记得你说过:“这辈子,父母还没到过北京,一定要买只北京烤鸭让他们尝尝。”可惜平时的津贴都补贴了家用,只能在商店柜台前看了又看。我说:“用我的钱买。”你说:“不着急,下学期一定能买上。”穷苦的日子拖累了国华,孝心像霜打过的野草,不屈的尽头是芳华。

日子缓慢且焦虑,生怕我崩溃的指挥系主任和我同吃同住1个多月。“活下去,且活得好好地。”在我心里对自己说。

人声喧闹的球场,鼓掌呐喊的有国华。登高爬低的训练场上,有国华手把手的辅导。在我眼里,国华好似桃花,不仅给我们春的景致,更是我们坚守的精神支柱。他深深照着我,感染着我,也改变了我。我誓要以国华为榜样,深爱自己的事业,奉献自己的青春,甘当逐梦人,不负盛世。

三

当哥哥牺牲的消息传来,弟弟曹国富不得不回到兄弟俩曾经欢笑的地方——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辽头村。

父母在,不远行。国富本应留在父母身边,他毅然决然地投身消防。“纵使晴明无雨色,入云深处亦沾衣。”国华的梦想是国富深爱消防这个大家庭最好的注释。

国富和战友们摸爬滚打,在消防员日夜奋战的火焰里,试图告别昨日的心碎。我们敬佩国富义无反顾地继承哥哥遗志的忠诚。在桐花盛开的清明,我们看到了在国华那写满荣耀的地方,国富以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,专心致志于教书育人的探索,就是为了让兄弟们训练上少走弯路,火场上少流血。

“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,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……”那首《生来倔强》与曹国富的成长历程颇为应景,如泣如诉地书写着对国华的深深敬重之情。用曹春竹的话说,国华牺牲后,国富一下子长大了。国富从排长干起,不论进机关还是下基层,心中的执念不曾中断。每到一处,总是先把国华的一等功证书摆在最显眼地方。奖章、证书静静地叠放在一起,仿佛诉说着那远去的岁月。

敢通烈焰方成器,不鼓清风怎铸魂。向那众多和国华一样替我们逆行的英雄们致敬,唯有珍惜当下,才无愧于岁月静美。

念父爱

厉守龙

今年是父亲逝世八周年,也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,在这个值得家人纪念的日子里,总想为他写点什么。

父亲解放入党,当过车间主任、厂长、党支部书记。1962年,响应国家号召,带头举家把户口从杭州迁移到农村老家。父亲对我的爱是那么地特别,这“特别”两字,我是在成长中慢慢体悟的。

我上小学报到那天,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叫父亲陪我前往。父亲则说:“守龙已经这么大了,路又不远,让他一个人去锻炼锻炼。”我误以为是父亲不关心我。但一天傍晚,下起瓢泼大雨,我没带伞,正当想等雨小一点便冲出去时,随着“守龙”一声呼唤,我看到冒着大雨、裹着湿淋淋雨衣的父亲,一手握住自行车把,一手挥舞着雨伞。一瞬间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诸如此类的事,发生过很多次。

上学期间,我得过三好学生、学习积极分子等大量荣誉。四年级下学期,我带着“双百”喜报和试卷回家,母亲高兴万分,父亲则细细看着试卷说:“个别题目我认为还可答得更完整,作文的字也可写得更好些。你说对吗?”我嘴上支吾着:“对,对……”但心里不服气。当晚,父亲和我促膝长谈,有两句话令我记忆犹新。“成绩只能代表一时,不能代表一世。”“成绩面前一定要找不足,这样才能不断进步。”

1972年2月,原东阳上卢公社党委推荐我为民办教师,1980年5月,我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数月后,学校党支部派人找我谈话,既充分肯定了我的积极工作,又客观指出我的不足,让我克服些许娇气,继续接受党的考验。这番春雨润苗般的谈话,让我感触尤深。后来我知道,组织上本决定将我列入下批发展对象,是我父亲主动提出,延长对我的考察时间。

那天,前来了解情况的杜校长和我父亲说:“你儿子各方面表现都不错,党支部决定把他作为这次新党员发展对象。”没待杜校长把话讲完,父亲却说:“我那小子呀,人是聪明的,工作能力和魄力也有,就是骄气太重,容易犯患得患失的毛病。还是先发展其他优秀同志,让他多些时间经受组织的考验吧。”

父亲这些特别的爱让我终身受益。在那时,教学写稿双丰收,曾获优秀教师、优秀党员、优秀通讯员、外宣先进个人等各种证书300多本,发表文章5000多篇。退休后,仍紧握手中之笔。“要在思想上真正入党”这句话已深深烙在我心里。



中国画《富春江严陵濑钓台》余任天 作

我的爷爷余任天

余冬筠

在我心里,爷爷是一位让人敬佩的艺术大家,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生钟爱的艺术创作,在诗、书、画、印,还有书画、文、物鉴赏,各方面都有所成就。他的人品艺德和艺术成就,赢得了众多大家推崇,潘天寿、沙孟海等先生都对他赞不绝口,称他为“四绝压群伦”的“艺术全才”。

在儿时模糊的记忆里,是爷爷和蔼的样子,家里人来人往、热闹非凡的场景。与哥哥姐姐在爷爷亲自篆刻的桌椅上攀爬、嬉闹是我最欢乐的时光,天井里看似无序又充满生机的花草,还有那张巨大的桌子——既是爷爷的画桌,又是一家子围坐在一起说笑的餐桌,总有一盆不加修剪自然盛放的水仙。老房子里一整墙的画和一整墙的毛笔,像相片一样一幅一幅,一遍遍在我们玩乐时不自觉刻进记忆里。

小时候,我就觉得爷爷很厉害,让我感到骄傲。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就曾挂着他的作品《富春江严陵濑钓台》,另一幅是潘天寿先生的《映日荷花别样红》。长大后,我常常听父母和叔叔伯伯们讲起以前的故事,又看到许多艺术大师对爷爷的评价,渐渐地,他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变得更加丰满。

如果说艺术成就是花朵的绽放,那么爷爷身上“矢志追求、乐观豁达、淡泊名利、心怀天下”的精神,就是滋养花朵的源头之

水。我想,爷爷留下来的,不仅是一件件艺术作品,还有他令人敬佩的人格品德。

爷爷1908年出生在诸暨浬浦镇,7岁时进入浬浦初级小学堂。从描画小学课本的插图开始,他表现出对绘画极大的兴趣和天赋。11岁开始作画、刻印,17岁能作诗填词。也是这一年,他进入私立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开始专业训练。两年后,又转入私立浙江艺术专门学校。后来,因为家里困难,爷爷不得不辍学回家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,终其一生坚守初心。

爷爷曾写过一首自勉诗:“一艺功成岂偶然,人功天分两相连。还需养源头水,寂寞楼居四十年。”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——心无旁骛、潜心追求,也造就了他在诗、书、画、印、鉴赏方面“皆通、皆深”。

比如,潘天寿先生自己精于治印,却偏爱爷爷的刻印,一生中有三十多方印都是爷爷刻的,其中“强其骨”“知白守黑”“一味霸悍”这三枚印章,更是常常使用。

又比如,爷爷的诗大多伴随着绘画产生,画完一幅,题写一首。他留存的诗稿多达2000余首,潘天寿、吴茀之、赵朴初等先生无不对他的文学功底感叹不已。

爷爷的鉴赏眼力也很好。吴茀之先生收到古画犹豫不决时,就会请他撑眼。爷爷说“真”,便签字付款。仔细深究,在这双“火

眼金睛”背后其实是深厚的学识和修养。

纵观爷爷的一生,他的创作道路充满磨难。但即使是艰难困苦的岁月,他也从未向命运低头。

哪怕是在为解决家中的柴米油盐而不停刻印、写字、卖画和经营旧书铺的日子里,他也会抓紧一切空隙读书。在最难挨的日子,爷爷就坐在窗口的画桌前,双手搓搓热,画一幅《梅花傲霜雪》,心中的忧愁顿时烟消云散。

爷爷59岁时,患上了视网膜脉络膜炎,当时的条件无法治愈,后期近乎盲人。他被迫放下朝夕相伴40余年的刻刀,从此不再刻印。可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为了分辨各种毛笔的用途,他在十多种大小用途不同的毛笔上贴上胶布或拧上螺旋丝,作为标识,作画时全靠手触摸。无力购买好的墨笔纸张,就买7分钱一支的普通羊毫笔和4分钱一张的皮纸,后来为了节省纸张,他又把宣纸接成长卷,每天练笔。日复一日,层复一层,用来练笔的长卷变成了墨卷。看不清字了,他又用毛笔蘸着清水,继续在墨卷上书写。如今,遗留下来的十几卷墨卷也是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写照。

爷爷一生最爱梅和竹。他最后的绝笔《梅竹图》画了一枝老梅,两竿青竹,上题“竹风清送暗香来”,用来比喻自己的志气和风骨。(本文作者为余任天孙女余冬筠)